

台湾慰安妇问题的最近动向

今年夏季,台湾岛内关于慰安妇问题接连出现引人瞩目的事件,这里简要作一介绍。

一、5名阿妈出征东京讨公道

经过6年的努力,台湾慰安妇的幸存者终于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她们于1999年7月14日,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认罪并予以赔偿。这是继中国大陆、韩国和菲律宾的慰安妇幸存者诉讼后的又一起要求日本政府谢罪的案件。

7月10日,台湾老人阿珠、春桃、阿桃、阿妹和玛兰5人参加了台北妇女救援会举行的“声援阿妈——台籍慰安妇对日诉讼开步走”的活动后,于12日飞赴东京,接着在14日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诉状。这份厚达130页的诉状书,由日本义务律师团执笔,它记述了60年前9名十七、八岁的少女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并从国际法、民法和日本宪法等方面对日本政府的责任作了详细的论证。如阿珠老人是台湾地区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慰安妇幸存者。在日本人的诱骗下,1938年她从基隆出发,先后在广东、香港、新加坡、缅甸和越南等地充当性奴隶长达7年之久,受尽苦难和折磨。日本战败后她辗转回到台湾,而同去的18名台湾姐妹中,只剩下两人生还。幸存下来的她右耳已聋,生殖器也被弄坏了,慰安妇的遭遇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现在,她和她的姐妹们一起,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给予每位幸存者1000万日元的赔偿。台湾慰安妇对日诉讼的义务律师团包括以王清风为首的台湾律师团和以清水由规子为团长的日本律师团。目前,这场诉讼已经展开。

二、《台湾慰安妇报告》出版

1999年7月,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主编的《台湾慰安妇报告》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300页的著作分为5个部分,第一篇为历史背景,叙述了日本在台殖民政府对慰安妇的征集、运输等过程。第二篇是3份调查分析报告,记录了台湾地区慰安妇的个案、调查材料的分析和原住民被强征慰安妇的概况。第三篇刊载了14个慰安妇辛酸的故事和生命历程。第四篇介绍了亚洲战争赔偿运动过程,并明确表明了反对日本以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的民间形式进行赔偿的做法,要求日本政府对此充分认罪。第五篇辑录了5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文章,其中有向慰安妇捐助150万美金的李敖的文章《义助慰安妇》,陈菊的《悲凉的落花——奋战中的亚洲慰安妇》等。

《台湾慰安妇报告》的出版,完整记录了1992年慰安妇问题曝光以来,台湾地区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的概况,从而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该书的问世,必将有力推动台湾地区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深入,并大大增加人们对台湾地区慰安妇问题真相的了解。

三、慰安妇的征集涉及台湾重要家族

在台湾,不少山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女子被日军强征到战场上充当性奴隶,其总数达数千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德兰经过多年的研究,于1999年7月发表了《台湾慰安妇调查和研究资料集》一书。她指出,被日本强逼为慰安妇的女性中,朝鲜人约10余万人,日本约2万人,台湾至少有1200人,此外还有大量的东南亚各地的妇女,以及数百名西方人,而中国大陆人最多,超过20万名。这一观点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一致。该报告引起轰动的是,作者在查阅台湾省文献会珍藏的3000册《台湾拓植株式会社档案》时,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台湾的慰安妇征集,相当部分是通过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进行的。1936年,日本为了推

行南进政策,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拓植株式会社,它由日本官方和财阀企业合资建立,其使命是代表台湾总督府在华南、东南亚地区从事军事和经济活动。因此“台拓”的业务范围极广,包括1939年它在海南岛兴建海军慰安所。为了发展慰安妇事业,“台拓”联合当时台湾的豪商巨贾建立“福大公司”,负责贷款给经营慰安所的业者,并在台湾招募妇女,作为慰安妇送往日军基地提供性服务。福大公司的档案相当完整,清楚记载公司的股东大多是日本人,但也有一些是台湾本地人士,如中部的辜显荣(辜振甫之父)、辜振甫(和信企业集团会长、台泥董事长)、辜宽敏、辜濂松(企业集团副会长、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负责人)、辜伟甫等,板桥林家的林熊徵、林熊祥,以及高雄陈家的陈启峰等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了慰安妇的征集、运输等,还须调查,但他们都是股东这一事实是没有疑义的。在1939年的一次股东会议的记录中,明白无误地记录出席人包括了辜振甫、陈启峰、林熊徵、林熊祥和颜钦贤等人。朱德兰研究员的报告一经披露,便引起了台湾传媒的争相报道。辜振甫立即表示,其父辜显荣去世后,他在福大公司的200股转至儿子辜岳甫、辜振甫等人名下,这是日本当局为笼络台湾人心所安排的“人头股”。但有学者指出:罪大恶极的慰安妇事件,固然日本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但那些为虎作伥的人也应负责,他们在日本政权下左右逢源,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也应负起对慰安妇的赔偿责任。

(陈丽菲)

“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安举行

张学良基金会、辽宁大学历史系、台安县人民政府于1999年8月6日至8日,联合在辽宁省台安县举办了“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和日本、韩国学者共60多人与会,提供论文60余篇。

这次研讨会涉及的有关张学良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出生日期(有学者考证张生于1901年6月3日);张学良和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东北政务;张学良的文化性格和宗教心理;张学良与一些历史人物的关系,等等。

有论者认为,张学良主政东北,并非因张作相与扬宇霆的相争和张作相的极力相让。而作为少帅的张学良19岁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便参加奉军,从团长、旅长、师长、军团长直至方面军司令,从少将、中将升任陆军上将,久经战阵,军事指挥才能、经验皆为上乘,因此,张主政东北乃水到渠成之事。

有日本学者根据搜集到的张氏父子两代主政东北期间颁布的300多件排日法令,认为不能简单地批判张作霖是军阀、卖国贼,应承认张作霖亦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另一日本学者研究、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货币流通状况,指出这期间在辽宁现大洋票取代奉天票而成了基本通货,在吉林、黑龙江“哈大洋票”开始占据优势,说明张学良初步实现了东北地区币制改革的通货整合。随着日军的侵略,这种通货整合被中断,出现了通货紊乱的状况。

还有一位日本学者,以《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反应》为题,认为:1.在中苏两国围绕中东铁路爆发纷争之时,日本的态度是“表面中立,暗中策动”,比起国际协调来,日本更重视其“满洲”利益。2.苏联的对华作战严重地刺激了日本陆军,一方面使其认为苏联已恢复甚至还超过了俄罗斯时代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使其加速

了解决满蒙问题和建立“满洲国”的构想,并加深了对事件中惨败的中国军队虚弱本质的印象,增强了其击败中国军队侵占东北的野心。³ 中东铁路纷争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与苏联作为大国的复活。⁴ 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联俄制日”战略失去可能。

研讨会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可喜的突破。有学者利用台北大溪档案,论证分析关于蒋介石不相信张学良通共的问题。提出:1936年张学良和东北军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的过程,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军中的谍报人员密报南京,陈诚亦将张学良与武汉行营研究委员会委员长冯庸所谈不愿剿共、一心抗日的的内容转告蒋介石,蒋甚为焦急,多次电询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并直接致电张学良,问及与冯庸谈话问题,张否认托冯庸转达陈诚之语。蒋介石此时已确信东北军通共,但仍相信张学良忠于他,认为只要有张在,东北军不会出现大问题,因此蒋才坦然于10月从洛阳赴陕。有学者从整理罗章龙诗歌、哲学文章入手,发现在1931年被中共中央开除的罗章龙等人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后,其成员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等,于1931年前后陆续得到张学良信任,其中潘文郁、吴雨铭还为张学良辅导伴读,使张了解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早期业绩,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产生会晤罗章龙的念头。并考证出,除1935年4月25日张学良曾赴开封河南大学会晤罗章龙外,1936年4月和同年八、九月间罗两赴西安与张学良会晤。罗章龙与“非委”骨干黎天才等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到智囊团作用,并参与事变决策和八项声明的起草。研究者表示,要把这一段历史搞清楚,以推动西安事变的研究。

会议期间,与会者参观了台安县张学良出生地,台安县新民小学(现名实验小学),台安县服装厂等3个工厂。(本刊)